

主编 许 毅 副主编 潘国旗

從百年屈辱 到民族復興

——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科学出版社

顾问 金普森 孔永松

主编 许毅

副主编 潘国旗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新中国外债与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元孝 柳 敏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潘泽新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主编 许 毅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富达印刷厂印刷

三佳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16 印张 390000 字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8-5036-9/F·4308 定价：31.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论

许 毅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会议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基本统一了领导的思想，提出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认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那时，许涤新同志正在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齐燕铭同志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我多年思考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要我研究财经理史。在齐燕铭同志和张劲夫同志的指导下，由我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和杭州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学院以及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党校、赣南地委党校、江西省财政厅的一些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央苏区，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

齐燕铭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过程

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因操劳过度，不幸以身殉职，未能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的正式出版。这样，完成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和财经史研究的工作，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身上。在编撰《长编》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主要有金普森、孔永松、陈宝森、沈经农、星光、赵秀山、刘正言、赵效民、周士敏等同志），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编辑《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20多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财经史。在这些同志的组织下，各地先后出版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31种，共40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所有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地财经史打下了基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又要我主持清末开始的外债、外资史料的整理和外债问题研究。于是我组织了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和金融研究所参与的外债史料整理小组，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清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江苏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协助下，先后整理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卷）、《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4册）、《上海市外商外债档案史料汇编》（1~12册）、《中国外债档案史料选编》（1~3册）以及其他一些史料。

在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中

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如何在乡村发展壮大，建立红色政权，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如何用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落后的小农思想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形成所必须回答的。

实际上，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就是为了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说，为什么依靠落后的农村，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能够打败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

研究根据地的财经，必然要联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及其性质，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人民政府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政权，它们的性质和使命都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地研究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小生产的农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同时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说，由工人阶级领导来实现资产阶级没有进行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改变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

通过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逐步深入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

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且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我们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为纲要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实现了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胜利。但是落后的农村小生产不能形成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主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那部分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的生产资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调整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初步完成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然而它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认为必须要研究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工业经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过程，尤其要研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后，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在政治上已经具备了立国的条件；而没收国民政府的官僚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大生产的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僚垄断经济是有它的特色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特色时，需要从中国垄断资本形成的特殊性入手。

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是通过金融垄断起家的。1927～1937年间，初步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官僚资本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为了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在沦陷区进行了以掠夺中国资源为目的的

建设投资。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没收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在华资产，扩张了在华的经济势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全面接收了敌占区所有的日伪控制的经济设施，使“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的势力迅速膨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部分资本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此外，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冻结中国在境外的资产。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宣布没收英美在华资产。

这些近代化大生产，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部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所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依靠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和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准备了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和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在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形成的特殊性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特殊性。

既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直接来源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生产力从哪里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的老领导黄逸峰同志当时负责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他和姜铎同志深入研究了近代

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发生发展状况，尤其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洋务运动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由此启发了我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问题。我在研究外债问题时发现，外债恰恰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由此而从外债着手，作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入点，联系清代洋务运动与外债的关系，进而着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形成，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即如何在封建统治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①

这样，在研究根据地财经和近代外债的过程中，我们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开始追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由来。

既然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而洋务运动直接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借外债和进行洋务运动呢？

通过外债史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械制造业，从而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大生产。

外债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面前，用东拼西凑的传统办法已无法解决，不得不走上了借债赔款的道路；而洋务运动的产生，则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给清王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创痛，为了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开始实施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国家政策。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以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

^① 说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实际上并不“完全”。

列强入侵造成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考察,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探究中国迅速从“康乾盛世”衰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历史动因。

“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之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①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灭”的历史原因。

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探索,使我们“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这样,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要求,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从实践的结果来探索其原因,“以果溯因”,层层探索,按照历史和逻辑统一,根据矛盾分析的原理,从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了解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我们以外债作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原因,通过对这些因果演变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加深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了解,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以史为鉴”。

这样,我们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了“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为目的,我们决定编写《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系列丛书,依据历史进程,编为四卷。

① 《学习时报》,2000年7月17日第1版。

得出今天的结论，形成这样一套丛书体系，是一步步的走过来的。从开始整理外债，进行外债史研究，经过 10 多年的摸索，我在 1988 年发表了《“两声炮响”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提出了外债的两重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又着手深入研究、分析了清代外债的债项及其作用，从而认识到清王朝的腐败是鸦片战争失败和外债产生以及清政府衰亡的基本原因，外债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代外债史论》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书出版后，我并没有停止思索，而是进一步在更深广的历史层面，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力求摆脱就外债论外债的局限性。为此决定编写《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拟以外债为切入点，结合已有的外债史研究成果，从洋务运动着手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进而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依据。

举借外债、洋务运动都具有两重性，它们一方面利用国家的权力所形成的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了先进技术，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丧权辱国，出卖主权、资源，并用向人民掠夺的形式归还外债本息。这样取得的资本和为归还本息所采取的筹集资金的形式，都是中国式的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一般的落后国家和非典型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要采取这种形式。

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即内债）来创办工业，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其他国家也有。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来创办近代化的工矿企业，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

此外，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五口通商而开始出现的买办，

他们给外国商人经理买卖业务、做经纪人，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资本，投资于近代企业，这也是一种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性。

我们不仅要研究外债的形成及其用途，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债与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的交互作用来分析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特别是外债和洋务运动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虽然有票号和钱庄等机构，但它们主要是为封建政权服务，主要业务是代理藩库的资金汇划和军事经费的筹集管理，无力也不可能进行中国近代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筹集和投入。

通过举借外债和洋务运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以洋务派举办的四大军工企业为先导的近代机械大生产的生产力。在它们的带动下，近代军事工业由点到线迅速延伸。同时，军工企业在各地的发展对交通运输及煤、铁等原料提出了新要求。为此，清政府决定成立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民用企业，它标志着中国新式轮船运输业的开始。

随着军事工业的扩展及轮船招商局规模的扩大，煤铁的供应就成为燃眉之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洋务派又着手用新式机器开采煤、铁矿。

洋务运动持续 30 多年，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买机器、建厂矿、造枪炮、办海军、架电线、修铁路，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钢铁工业为龙头，航运业、采掘业、纺织业初步发展的近代工业结构。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洋务派集中地运用了国家财力，强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举借外债更成为洋务派主要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的 30 年中，共

举借洋务外债 14 笔，数额为 795 万两（库平银）。这些外债对购买机器、创办厂矿、兴办海军、修筑铁路、搞活企业等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清政府人为的限制，使这种利用外资的活动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是较小的。

综观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内部投资结构自始至终是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在各工业部门及其内部之间的投资比例不协调，轻工业与重工业及轻重工业内部之间的投资比例不合理，特别是工业和农业脱节，形成城乡对立。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在外国资本入侵后被动地进行的，洋务运动是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革命或改良运动的政治环境中展开的，为维持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国侵略，它一开始就集中投资于军事工业，而不是循着“轻纺工业—整个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工业化”这一世界一般性工业化道路发展；走了一条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轨迹，没有进行农业工业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制约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效益和速度。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工业经济内部结构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尤其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为加强军事力量，电力、钢铁、化学等新兴重工业部门的比重和生产能力在整个工业结构中再次居于重要地位。同时，中国近代大型工业生产的一半集中在上海。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工厂西迁和后方工业一度超常发展，使产业布局集中于东部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战争结束后，大批企业重返东部，加剧了生产力区域布局的不合理。这种格局制约着全国各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并且对现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有重要影响。而农村经济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

代时期，依然停留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水平上，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共同压迫下，整个中国农村陷于破产。

要分析外债的两重性，尤其是外债的积极性的一面，就要研究它是如何产生、演变的。为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历史，进一步探讨盛衰兴亡的历史周期率。^①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腐败之所以能够发生，还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能够满足腐败者贪婪的欲望。“康乾盛世”中，一方面乾隆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一方面国家稳定，四海升平，从而为腐败创造了条件。从皇帝乃至王公贵族、封疆大吏，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面对丰富的社会财富，个人私欲迅速膨胀；在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下，无所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从而导致整个统治机器的朽败，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回顾这一段历史，许多人都产生疑问，发出穷则挨打、落后就要挨打的感慨。事实上，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国富民丰，既不贫穷，也不落后。但正是因为富有，才吸引了侵略者的兴趣；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因盛而骄、骄奢而腐和不思进取，昧于世界大势，“闭关锁国”，不愿“开眼看世界”，才导致中国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吞掉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

^① 关于兴亡周期率的论述，比较为人熟知的黄炎培 1946 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一番对话。详情参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8～149 页。

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化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富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这就是清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在形势变化和人心向背的作用下，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我认为，分析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短命、夭折，也必须要从外债切入，分析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债为手段，在当时中国社会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斗、较量中所起的作用。如四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直接是为辅助袁世凯复辟的；日本的“西原借款”，直接是为了维持段祺瑞所控制的北洋政权的。虽然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却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在北洋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内外勾结和双重压迫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进一步加深。外债在这一时期粘连着中外反动势力，剥夺着中国的主权，榨取着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支持着北洋军阀封建复辟势力，阻碍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不懈地与北洋军阀封建复辟势力进行着斗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相结合，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并成立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旨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风暴。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彻底打败了北洋军阀封建复辟势力，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北洋外债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一书是我们以上研究的一个总结。

在北伐战争胜利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理论，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被迫转向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我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一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政治、财经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许多人指责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为新军阀，以区别于旧军阀——北洋军阀。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革命斗争的策略口号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尤其不能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庸俗化为军阀混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牢固和封建上层建筑的顽固一直牢牢统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是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无力摆脱封建母体，因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外债，所以也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决定了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同样缺乏彻底性。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色，同时决定着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

我认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和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这是我们进行外债史研究和晚清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一直重视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直接来源是资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

《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这一卷的编撰。在书中，力图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并发展壮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与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过程与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解放战争为什么在中国取得胜利？外债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发展变化及其作用分析。

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即使到了北伐战争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取得政权，也只统治着 16 个省，不少地区仍被封建军阀势力割据着，所以没有真正实现过全国的统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受到极大限制，广大农村仍处于封建剥削的小生产地位，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属于什么性质呢？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分析，揭示了生产方式一元论的科学原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①

我认为哪一种生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并由它产生的上层建筑，必然是代表这个生产关系的阶级居于领导地位，这个国家就为这个阶级所统治。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过混合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出现过混合的阶级统治。所以说，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代表资产阶级意志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国情，正确认识不同时期的经济基础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从而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